

莫斯科的孔夫子

李明滨

70年代初期,在所谓“批林批孔”的年代,一篇《孔老二在莫斯科》的文章,把在那里热心于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学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骂倒。

如今这些人怎么样了,他们的儒学研究有什么进展?这是近年来我们赴俄考察时注意的一个重点。然而人物众多,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先接触一下其代表人物稽辽拉。

不寻常的学术生涯

我在莫斯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又一次见到稽辽拉。他就儒学与现代化问题作的精彩报告,很引人注意。稽是俄国汉学家,但这样说他的身份,似乎还不完全,应该说他也是华裔。父亲稽直系老华侨,早年赴俄国远东做工,参加过苏俄革命,当了红军。后与俄国姑娘结婚,生的儿子随母姓,入俄籍,因而辽拉另有俄国姓氏:贝列罗莫夫。如今,他以此姓名任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提起贝列罗莫夫的名字,俄国汉学界没有不知晓的,都说他是崇尚儒学的古代文化专家。这并非全是由于他举止温文尔雅,待人亲切谦和,颇有“夫子”的风度(也许是有中国血统或受家庭影响使然),更是因为他不同寻常的学术生涯。

他1928年出生于海参崴,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尤以古代政治文化为重点,1954年即以《秦帝国的建立和崩溃(公元前221—207年)》一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以他这样的汉学基础和文化素养,照理说从事深入的汉学研究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在当年的苏联,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遂。不错,早先他曾风光过一阵子。父

亲50年代中期回国时因系苏俄革命的有功人员而备受尊敬,曾被中国政府某部聘请为顾问,名誉称号,极是荣耀。而辽拉也一向以此为荣。直至80年代两国在中断了20年的交往之后恢复来往时,他还念念不忘其父的故乡,迅即搜集父亲稽直遗留下的所有文物送到江苏省镇江市有关博物馆,让后人得以了解其父光荣的历史。如果你到莫斯科访问他的家,一进居室的厅堂就可以看到那面高挂的锦旗,上面绣有醒目的汉字:“稽辽拉同志捐献共产主义战士稽直同志革命文物纪念,镇江市人民政府,1987年2月”。

然而事情总有周折,何曾想到后来中苏会交恶,甚至中断交往。父亲的荣耀竟成了辽拉的麻烦。虽说他是苏联公民,总因有个中国父亲而使人不放心。在苏联研究什么课题自然有无形的限制。现实问题太敏感了,好在他精通古文,就铁了心去钻古的罢,躲进秦朝以前更安全,冷板凳一坐几十年。

但也不得安生,一有什么事发生,或是形势紧张,就号召他学习“巴甫立克·莫罗佐夫”的榜样。何谓“巴甫立克·莫罗佐夫”?原来那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一位少先队员,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格拉克西莫夫卡村,因揭发富农父亲而被杀害,死时年仅14岁,从此被树为“大义灭亲”的典型。用这样的例子要求于贝列罗莫夫的是什么行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由此可见当年他在苏联所处的地位。可是说也怪,迟迟不见辽拉有什么能同父亲“划清界限”的举动。倒是钻进故纸堆里做出了成绩,竟以论秦朝古代问题的论文在1970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法家学说和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问题(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同时,还在1968年翻译出版了《商君书》,为译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文。通过序文和注释阐发了多年研究的心得。

他从此成为苏联有影响的法家学说研究者。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当时正担任苏联公安部长,他通过东方学研究所的汉学家杰柳辛向辽拉要书去看,由此辽拉推断:那个领导人也想学法家了。

更没想到的是“四人帮”要“批林批孔”,在这边气焰嚣张,而辽拉居然还在苏联那边写颂孔的文章。这在江青一伙看来简直是逆流而动的“反动派”。不但牵连其父亲,而且勒令给他“送去”大批判。由中国一家大报撰文并通过电台广播,题曰《孔老二在莫斯科》,对那边包括辽拉在内的一批宣扬儒学的人大张挞伐。孔子本来有名字,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夫子,还有更尊贵的称号: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然而在竭力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人帮”看来,那一切一文不值!人都要打倒了,哪里还用得着尊称!他们就以孔子排行第二而故意称之为“孔老二”,以示轻蔑。他们也挥起这根“孔老二”的棍子去打莫斯科的孔子学人。

可见辽拉在两边都不讨好,当年真使他百感交集,觉得做人真难,哪怕选择与现实不搭界的远古问题进行研究,也不见得能求平安。

稽辽拉究竟积习太深,不知“悔改”,还是那样执着。据他说,研究孔子,除了景仰和兴趣,还出于一种责任感,觉得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总要对两边的人民有所贡献。传播儒学和传统文化是最佳的方法。深入钻研也就更有动力。

不过,“批林批孔”倒使辽拉离开“冷板凳”的位子,逐渐开始“热起来”。据他的体会,那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弄不清这场势头很大的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现实的目的,他们一向对中国远古的问题未予理会,此时就焦急起来了,便想起了辽拉,1973年就把他从东方学研究所调到远东研究所,企望他在解答当代问题的研究中效力。

多年的探索使他悟出了一番大道理:儒学可以古为今用,而且适用于俄罗斯。1990年6月,他来到北京大学参加“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就在“文化与文化交流”那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激昂的发言,说:“你们都在讲现代化,不但经济、生产要现代化,而且思想、文化也要现代化;而我们则相反,要诉诸古人,请教古代的贤哲,我主张向孔夫子的学思想。奇怪吧!”

以后他曾多次做过论述,认为俄罗斯是个具有

欧亚双重国情的国度,俄国政治家不应当把眼光只瞄准西方,应该关注东边那个最大的邻国在发生什么变化。尤因儒学文化圈内发生经济腾飞的国家和地区,从日本到“四小龙”,例如著名政界人士李光耀先生,都把自身的成就归功于奉行了儒学。经验证明儒学有益于现代化,它能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时来运转,80年代以来他著述不断,并活跃于各种儒学学术会议,奔走国内外,乐此不疲。特别常来中国,从1987年的曲阜朝孔祭孔到1994年的北京孔子国际联合会成立,几乎历届的年会他都参加。尤其令人刮目的是连续推出几本有份量的著作:《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1981)、新版译并释《商君书》(1992)、《孔子的〈论语〉》(1992)以及最新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后一本书长达440页,对孔子和儒学做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是俄国历来最有份量的一部研究孔子的著作。

由于不懈的研究和卓越的成就,他于1995年被推选为俄国孔子学会会长。

独特的研究成果

贝列罗莫夫博士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之出版,实际上就使他成了俄国新儒学的代表。正如作者在介绍写作过程时所说的,写这部著作的动因来自1972—1974年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它促使作者去考虑“古与今”、“儒学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在过去,他虽然长期涉猎中国古代史,但久久不敢涉及孔子,怕这个题目太大,没有足够的水平和能力。因而早期只能绕着圈子走,研究了孔子的两个对立派,即秦始皇和商鞅。那场运动之后,他便把落脚点移到当代,埋头研究了十多年,终于弄懂了“孔子的学说实际上同现代化很有关系、大有用处”这番道理(参见该专著第406页,后面所注页码均属该专著)。自然,这部书也代表了俄国当前研究儒学的最新水平。全书共设五章和一篇结束语。为供了解全貌,特详列其章目如下:

- 第一章 公元前四——三世纪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和政治文化的进程)
- 政治制度和国家经济的变化
- 社会结构的跃进——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公社的进化
- 公社自治机关以及它们在国君同世袭贵

	族等充分掌握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所发生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二章	孔子
	童年与少年时代
	求职
	成人
	孔子与门生
	在鲁国国君处供职
	少正卯案
	孔子在司库任职上的最后阶段
	流浪年代
	回归晚年
第三章	《论语》以及俄文翻译问题
第四章	孔子的学说
	孔子论人
	孔子论社会
	孔子论国家
第五章	中国的象征
	孔子的反对派和继承者
	全国规模的力量较量:秦始皇和孔子(公元前 213—212 年)
	儒学与孔子的命运
	第二次全国规模的力量较量:“四人帮”反孔子(1972—1976 年)
	孔子的复兴(1977—1990 年)

代结束语

全书的重点在于讲清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并阐明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这占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从第 5 页至 261 页)。有插图 8 个页码,含 15 幅图(包括孔子的延生地“夫子洞”和有“大成至圣文宣王”石碑的孔子墓两幅照片,其余为孔子在各地讲学、任职、与门生在一起、其门生孟子、曾子等的画像,还有一幅末代皇帝傅仪与孔子七十二世孙孔德茂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照片。这是俄国同类书籍中迄今最为详尽的著作,它对于在俄国宣传和普及儒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该专著在“《论语》的俄译问题”一节中,选出了 20 个儒学专门术语列表统计其中有多少词语经孔子的创造,以后已经成了词书里予以单独列出

的词条(如“仁”、“义”等),并以鄂山荫主编的《汉俄词典》(1952)、因诺肯季(英诺肯提乙)主教编《汉俄词典》(1914)和中国人编的各种《汉俄词典》(1977、1983、1989)等 8 种双语辞典为据,统计每个术语的重复率或常用率(第 167—171 页)。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术语在许多俄国汉学家笔下译成了千差万别的俄文名词;常见的俄译者(亦即俄国的儒学研究者)就有克里夫朝、贝列罗莫夫、马尔蒂诺夫、杨兴顺、库切拉、克拉斯诺夫、伊柳舍奇金、卡拉别江茨、科勃节夫、基达连克、克罗尔、斯皮林、扎瓦茨卡娅、马利亚温、费奥克蒂斯托夫、葛里戈里耶娃、西门诺科(第 172、174、175 页)、李谢维奇、罗日杰、刘克甫、布罗夫(第 426—429 页),以及老一代汉学家已故的院士阿翰林、康拉德(第 176 页),还有波兹涅耶娃、波波夫(第 429 页)等(参阅附录)。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使本书极具学术专著的性质而引起俄国汉学界(乃至国外汉学界)的重视。

此外,专著的特色还在于它强烈的现代性,其落脚点 是儒学对当代的作用,是孔子学说的现实意义。专著用很多篇幅把商鞅与孔子作对比(第 262—282 页),包括二者的社会观点、经济思想和管理哲学。一方面说明这两人对于创立中国国家的理论模式,对于这种国家体制的形成,贡献最大;说明他们两人各自代表中国古代在所有伦理——政治的、哲学的流派中,对国家的政治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起作用最大的两派,即法家和儒家;以及他们相辅相成,犹如阴阳两极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阐明孔子对于中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比商鞅要大得多。他在民族生活,首先是精神生活上的影响更为广泛和多方面。作者认为,孔子的学说不但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中国人思维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的思维和民族性格。而且这一切在东方当代社会发展中还会继续起作用。

作者进一步论述,儒学在当前俄国社会面临种种困难,人们情绪不佳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为俄罗斯前途担忧的人士当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第 408 页)。他认为,既然俄国具有欧亚的双重国情,那么就应该借鉴东方国家尤其中国的经验,儒学在中国的复兴便是明显的事实。在有关孔子的大量论述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对当前的俄国有现实意义,即“为人”和“为政”。

关于“为人”,要注意孔子有关三类国家的标准:

有道、无道和乱邦，以规范人的行为，做个有德行、对人民福利负责的人。他说：“在有道，即管理得很好的国家中，不出仕显名，仍为贫贱，就是耻辱；在无道，即治理得不好的国家中，还出仕显名，富贵显赫，那就是耻辱；在动乱危急的国家中，人们不要去居住停留。”（按原文为：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德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至于“为政之道”。他认为，人们更加熟知孔子如下的思想和言论：

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答曰：“统治者（领导国家的人）要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和取得民众的信任。”

子贡问：“不得已时，在粮食、军备和民信这三条原则中先去掉哪一条？”孔子答：“去掉军备。”

子贡问：“万不得已时，在剩下的两条中先去掉哪一条？”孔子答：“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难免于死亡，没有粮食只是人饿死。而民众如果不信任统治者（领导人），那么国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按，原文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回顾历史，中俄自从有文化交流以来，曾出现过几次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即所谓“中国热”。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成为俄国人士注意的热点，而以稽辽拉为代表的俄国孔子学人正在俄国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形成。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

附录 俄国儒学学者简介：

克里夫朝（1921—1985），译有《论语》，并作序。

马尔蒂诺夫，著有《明代的儒家学说、佛教和宫廷》等论文。

杨兴顺（1904—1988），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简史》。

库切拉，撰有《元朝中国传统的继承问题》等论文。

克拉斯诺夫，撰有《儒学在中国》等。

伊柳舍奇金，合著，同上书。

卡拉别江茨，著有《儒学四书中的人与自然》等。

科勃节夫，著有《儒学中人的本质问题》、《儒学社会中社会乌托邦的思想理论基础》等。

基达连克，曾师从冯友兰攻古代哲学，主编《中国哲学辞典》。

克罗尔，著有《历史学家司马迁》及司马迁论儒学等。

斯皮林，著有《中国古文结构》、《古代汉语词汇的结构》等。

扎瓦茨卡娅，著有《美学思想史·〈论语〉语言的用意》等。

马利亚温，著有《孔子》传等。

费奥克蒂斯托夫，编纂《中国哲学辞典》、作有《儒家的道德政治观点》等。

葛里戈里耶娃，作有《中国哲学对日本人世界观的影响》等。

西门诺科，著有《孔子的箴言》等。

李谢维奇，编译《古代圣贤文选》等。

罗日杰，作有《论中国古文结构》等。

刘克甫，著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等。

布罗夫，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等。

阿翰林（1881—1951）著有《中国古代经典译成俄文的新方法与新文体》（见《中国文学》文集）等。

康拉德（1891—1970），译有《诗经》、《孙子》，著《西方和东方》文集。

波兹涅耶娃（1908—1974），选译《论语》、《吕氏春秋》等。

波波夫（1842—1913）编选译《论语》。